

战国燕墓仿铜陶礼器生产供给模式研究

罗沅宁 井中伟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关键词) 战国 燕墓 仿铜陶礼器

(内容提要) 根据制陶作坊和仿铜陶礼器两方面考察战国燕墓随葬仿铜陶器的生产与使用情况,燕文化区各地制陶作坊具有日用器与陶礼器兼烧现象。当时战国燕墓仿铜陶礼器的生产模式可能存在着定制和批量生产两种,前者主要供给高级贵族,后者则普及中小贵族及平民。同时,战国燕墓仿铜陶礼器的生产具有地域性,无论是中心区(燕下都地区),还是在非中心区(燕山以北地区),战国燕墓中的仿铜陶礼器一般是在当地生产的,但非中心区制作批量化仿铜陶礼器的工艺不逊色于中心区。

(中图分类号) K87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83(2024)02-0062-07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4.02.003

Key words: Warring States Yan Tombs Imitation Bronze Pottery Ritual Vess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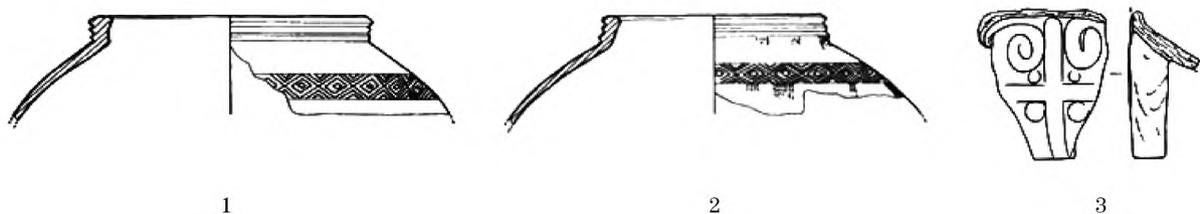
Abstract: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both pottery workshops and imitation bronze pottery ritual objects accompanying burials in Warring States Yan tomb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such objects. Pottery workshops across the Yan cultural area exhibited a phenomenon of simultaneously firing daily utensils and pottery ritual object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production mode of imitation bronze pottery ritual objects in Yan tombs may have involved both customized and mass production. The former likely catered to the elite nobility, while the latter was more widespread among middle and lower-class nobility and common people. Additionally, the production of imitation bronze pottery ritual objects in Warring States Yan tombs showe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ether in the central region (Lower Capital of Yan area) or the non-central region (the area north of Yanshan Mountain), imitation bronze pottery ritual objects in Warring States Yan tombs were generally produced locally. However, the craftsmanship of mass-producing imitation bronze pottery ritual objects in the non-central region was comparable to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

周武王灭商后推行“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政策,在这种大背景下,召公奭受封于燕,但他本人一直留任宗周,未曾就封,而由其元子代之。春秋以降,燕国的国力和地位逐渐提升,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自1929年燕下都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已经调查发掘了众多战国时期燕国遗存,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既有对城址、墓葬、长城等遗迹的专题研究,也有对陶器、铜器、铁器、瓦当等遗物的分期断代、工艺特征归纳,还有对陶文、玺印、货币等古文字研究。虽然学者们对战国燕墓仿铜陶礼器的分期研究有诸多说法,对其文化因素构成也多有探讨,如陈光^①、郑君雷^②、付琳^③、裴炫俊^④等,但对仿铜陶礼器的生产与供给情况则少有关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梳理讨论。

一、战国燕国制陶作坊遗址的相关线索

制陶作坊遗址是了解仿铜陶礼器生产情况的直接来源,目前,所知燕下都的制陶作坊为郎井村东11号遗址,但详情并未公布^⑤。北京西南的南正遗址曾发现7座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窑址^⑥,陶窑内出有陶罐和陶釜及印有雷纹的陶器残片,如Y1:15和Y1:16。窑址旁还出土两个陶鼎足残

片,其中,T0304③:2的残鼎足为三角形扁足,上饰有乳丁纹等纹饰,应属于仿铜陶礼器(图一)。该遗址并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墓葬,因而推测该仿铜陶鼎可能是南正窑址的产品。从窑址所生产的陶瓮和陶罐看,这些窑址主要烧制日用陶器,有时也兼烧仿铜陶礼器。



图一 南正遗址发现陶器残片

1、2. 陶器残片(Y1:15 Y1:16) 3. 残鼎足(T0304③:2)

二、仿铜陶礼器的生产与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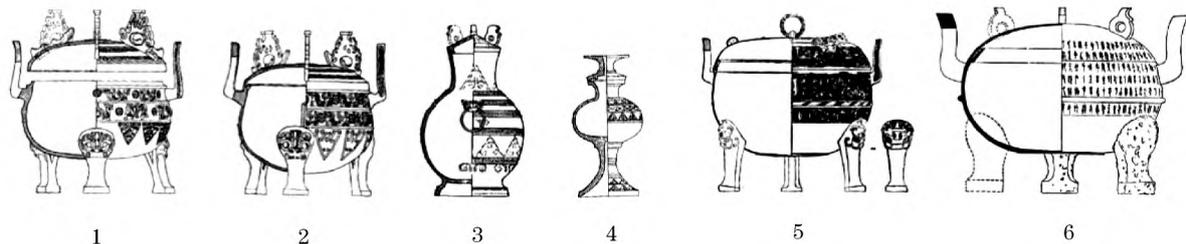
1. 仿铜陶礼器的生产模式

根据战国燕墓仿铜陶礼器的形制特征,推测当时燕国仿铜陶礼器的生产大致有两种模式,即定制和批量生产。

(1) 定制

目前所见,战国燕墓随葬的仿铜陶礼器有些制作比较精致,它们几乎完全模仿青铜礼器形制,纹饰兼具刻划和朱绘,其中,仿制程度较高的陶礼器无疑是向陶作坊进行定制的。在带墓道的高级贵族墓中,陶礼器鼎类的精美程度普遍高于伴出的其他仿铜陶礼器,以燕下都九女台 M16^⑦为例。

九女台 M16:57(图二,1)陶鼎,直唇上有三个出戟纹捉手的圆盖,圆盖隆起,垂腹圜底,兽面蹄足且鼎足出台。鼎身两侧有附耳,口沿下部及腹间刻有虎纹,虎纹之间有圆形涡纹,腹下有垂叶纹。九女台 M16:94(图二,2)陶鼎与前者陶鼎造型纹饰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此陶鼎腹内有一隔板。这两种陶鼎鼎足的形态与中赵甫铜鼎(图二,5)的兽面蹄足相似,腹、耳形态也很相似^⑧,稍有不同的是鼎盖的三个纽,这种纽的来源有人认为是来自平山三汲中山王所出的铁足大鼎(图二,6)^⑨。但笔者更倾向于这种火焰纽取象于燕国的青铜器,因为前者造型还有一定差异,似比铁足大鼎更加繁复。在九女台 M16:50陶壶(图二,3)上发现有与铁足大鼎相似的火焰纽,这可能是仿造铁足大鼎的火焰纽所制。这两件陶鼎的整体装饰在其他燕式仿铜陶礼器墓葬中未曾见过,但其纹饰的细腻程度、陶鼎形态的把握都极好。九女台 M16:81(图二,4),小口壶的纹饰虽不如其共出的盖鼎华丽,但其盖面刻划“S”形纹,肩和腹部有两周山形纹,中间为涡纹带,壶柄上有几周弦纹,圈足上也有两周山形纹。此墓有的陶礼器用彩绘进行装饰,或是素面,其装饰导致与铜器



图二 九女台出土仿铜陶礼器与中赵甫、中山王墓出土铜鼎

1、2. 陶鼎(九女台 M16:57 九女台 M16:94) 3. 陶壶(九女台 M16:50) 4. 陶小口壶(九女台 M16:81) 5. 中赵甫铜鼎
6. 中山王 M1 铁足大鼎

的相似感降低，但是，器物的整体造型与铜器相似度很高。

此外，九女台 M16 还随葬了一些复古陶礼器，有人指出九女台 M16: 174 (图三, 1)，其方鼎的腹部四壁和足跟部有扉棱，且为扁足方鼎，是西周方鼎的特征，与琉璃河墓地 M209: 28 (图三, 3) ⑩特征相似，而方鼎的鼎腹部分与安阳殷墟郭家庄 M160: 134 相似 (图三, 4) ⑪，认为此陶鼎是仿制晚商至西周初期的陶鼎所制 ⑫。九女台 M16: 78 (图三, 2) 的陶盃双耳、器口和圈足镂孔间饰连续的波曲纹的特征与河南省平顶山应国墓地 M84: 68 (图三, 5) ⑬相似，笔者认为很有可能是模仿西周时期的这种铜盃所制。这样的复古仿铜陶礼器不见于燕国的中小贵族墓葬，王腾飞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一些战国燕人可能收藏有其始封先祖之器，这些器物可能充当了其制造复古形态陶礼器的“粉本”，而随葬这些复古仿铜陶礼器是为了标榜血缘的优越，并维护社会秩序 ⑭。这样的复古仿铜陶礼器同样需要定制。



图三 九女台 M16 复古陶礼器与其原型铜器

1. 陶方鼎 (九女台 M16:174) 2. 陶盃 (九女台 M16:78) 3、4. 铜方鼎 (琉璃河 M209:28 郭家庄 M160:134) 5. 铜盃 (应国墓地 M84:68)

以上所列的仿铜陶礼器纹饰精美，造型与铜器相似度极高，很有可能是墓主人拥有相似的铜器，并交由陶作坊进行仿制。九女台 M16 还随葬了铸钟 10 件、甬钟 16 件、纽钟 9 件，这种陶乐器目前还见于带两条墓道的辛庄头 M30 中。除这两座墓葬外，仿铜陶乐器不见于其他仿铜陶礼器燕墓中，无疑陶乐器也需要向陶作坊进行定制。九女台 M16 拥有两条墓道，随葬陶礼器 143 件，综观战国仿铜陶礼器燕墓只有辛庄头 M30 可以与其媲美，其墓葬规格体现了墓主人超凡的地位，随葬定制陶礼器自在情理之中。

(2) 批量生产

与定制相对的则是批量生产。由于袁台子发现的战国燕墓数量较多 ⑮，其年代跨度较长，从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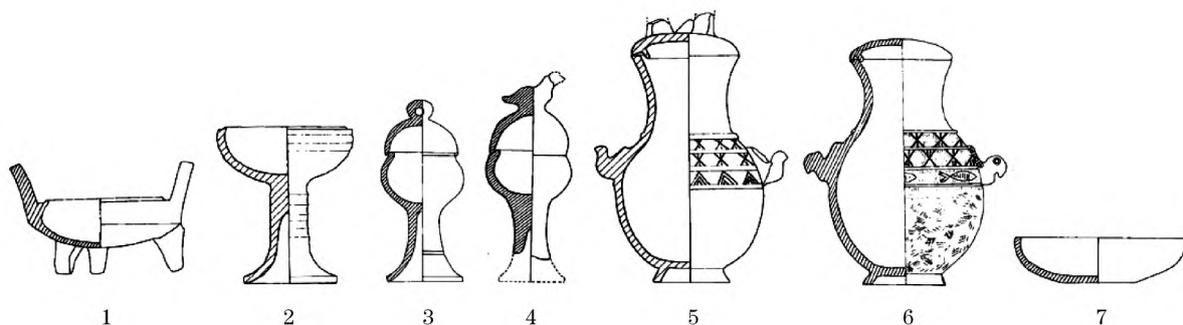
战国早期晚段	M35		M37	
战国中期早段	M1		M8	
战国中期晚段	M4		M31	
战国晚期	M14		XM22	

图四 袁台子出土仿铜陶礼器 (分期采自王腾飞 ⑯)

国早期晚段到战国晚期，陶器发展连续，墓室面积、棺椁数均相差不大，因此，以该墓地为例，说明仿铜陶礼器的批量生产。

袁台子墓葬的仿铜陶礼器与燕山以南地区的燕墓一样是鼎、豆、壶、小口壶、盘、匜组合，其仿铜陶礼器的发展也是一脉相承，陶鼎盖的捉手由半圆环状纽，到三个鸟形捉手，鼎腹由深腹变为浅腹，陶豆捉手由喇叭状到三个鸟形再到三个火焰形，最后捉手退化。陶壶由三个半圆环纽捉手，到三个鸟形捉手或火焰形捉手，小口壶由半圆环状纽到鸟形捉手，最后捉手消失。

从图四可以看出，鼎、豆、壶、小口壶、盘、匜的组合同时期同种器物形制相近，不同时期同种器物发展具有连续性。在装饰上从战国早期偏晚到战国晚期，纹饰多为三角纹，弦纹，甚至是素面，风格颇为统一。陶盖壶可以说是袁台子仿铜陶礼器中最精美的陶器，战国晚期之前的陶盖壶上几乎都有纹饰，多为弦纹、三角纹、动物纹、涡纹、圆点纹等随机组合。虽然大部分陶壶上皆有纹饰，但纹饰相对统一且形制相似，所以，依然可能是大批量生产的。但各陶盖壶依然有一些特色，与其他墓葬不同，表明有些陶盖壶可能是定制而成。如 XM9 出有两件陶壶，XM9:1 和 XM9:3，两者除盖纽一个为火焰形纽一个无纽外，壶形基本一致。而两者的鸟首形铺首于袁台子其他墓葬不见，这两件陶壶有可能是定制的，也不排除偶尔为之的可能（图五）。



图五 袁台子 XM9 出土仿铜陶礼器

1. 陶鼎 (XM9:10) 2. 陶豆 (XM9:4) 3、4. 陶小口壶 (XM9:8 XM9:7) 5、6. 陶壶 (XM9:1 XM9:3) 7. 陶盘 (XM9:2)

袁台子燕墓中的仿铜陶礼器绝大多数是陶作坊批量化生产的产物。陶盖壶是其中纹饰较为繁复的器物，尽管纹饰有较多元素，但同种纹饰形态一致，只是在陶壶上随机组合，因此，仍然是批量化生产的产物。袁台子 XM9 所出陶壶双耳与其他燕墓不同，有可能属于定制或偶尔为之，而与之共存的其他仿铜陶礼器，与同时期其他墓葬的陶礼器形态一致，结合其他袁台子墓葬从战国早期晚段起到战国晚期，陶壶装饰远比其他仿铜陶礼器华丽，说明在袁台子墓葬中，陶盖壶可能有着特殊的含义。

2. 仿铜陶礼器的地域性

仿铜陶礼器的地域性是指战国燕墓随葬的仿铜陶礼器是在当地进行生产的。由于仿铜陶礼器制作技术不高，且供需相对稳定，大多是在当地窑厂生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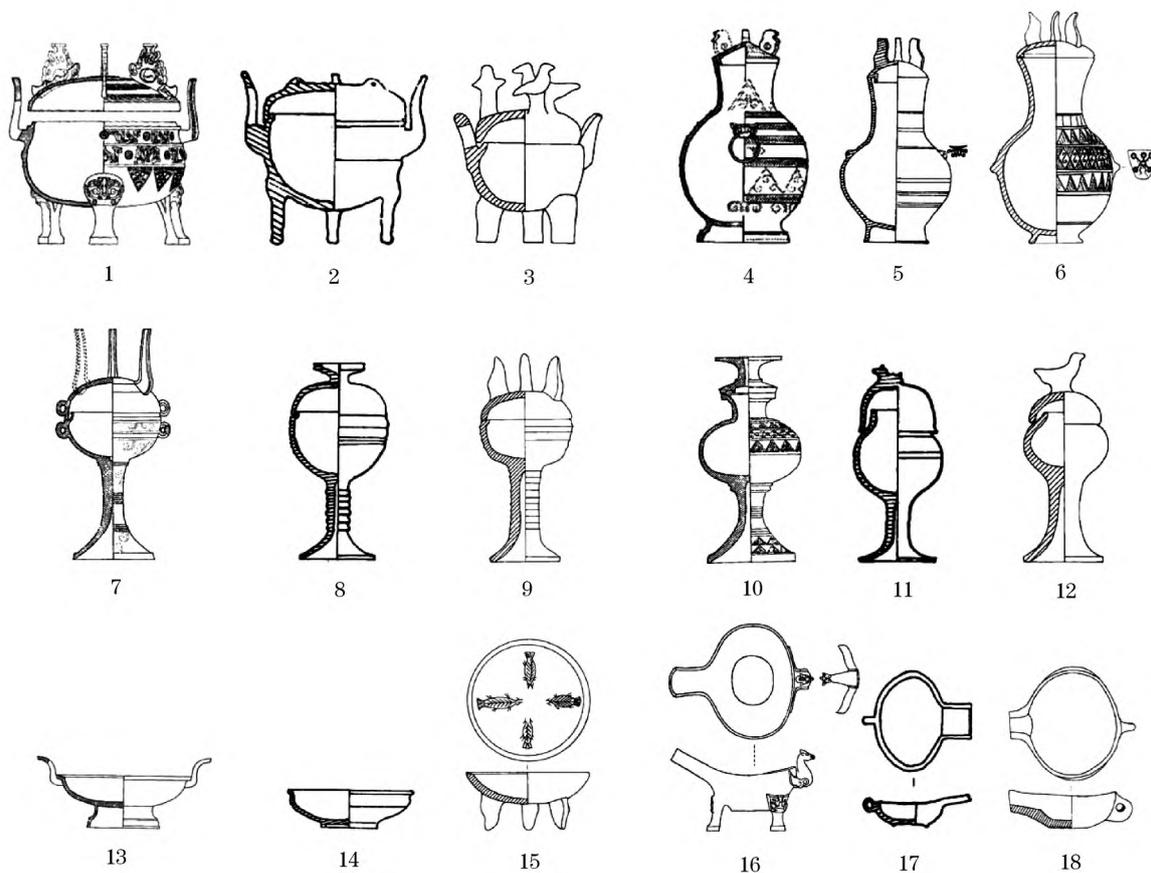
对于仿铜陶礼器燕墓的分期本文基本赞同裴炫俊所述^{①7}，但对于其所分的 0 段（春秋晚期）墓葬，即贾各庄 M8、M32 归入第 1 段（战国早期早段），对于袁台子燕文化墓葬，则支持王腾飞的分期结论^{①8}。本文将随葬陶礼器的战国燕墓按地区划分为中心区，次中心区及扩张区。中心区是燕下都及周边附属地区，次中心区是天津及其他河北中北部地区，扩张区是燕山以北地区。对比三个区域的仿铜陶礼器形制，会发现虽然随葬器物种类相对一致，但是，器物形态上却有较大不同。以中心区的九女台 M16、次中心区的大唐迥北淀 M3^{①9}和扩张区的袁台子 M3^{②0}这三座战国中期晚段的墓葬为例。

从仿铜陶鼎看，九女台 M16:57（图六，1），子母口，直唇上有三个出戟纹捉手的圆盖，圆盖

隆起，垂腹圆底，兽面蹄足且鼎足出台。鼎身两侧有附耳，口沿下部及腹间刻有虎纹，虎纹之间有圆形涡纹，腹下有垂叶纹^①。大唐迥北淀 M3 的鼎^②（图六，2），虽也是子母口，但直唇上有三个半环状小纽的圆盖与九女台 M16 的鼎盖不同，深腹圆底的特征与九女台 M16 的垂腹也不同。腹两侧附有长耳，鼎足形态与山东省淄博市辛店 M2^③的鼎足特点相似，陶鼎纹饰也没有九女台 M16 的繁缛，而仅仅在腹部有一弦纹。袁台子 M3:1（图六，3），与前两者相比，其隆起的圆盖上有三个较大的燕鸟形捉手，圆腹下有三个短小粗糙的蹄足，鼎腹特征为圆腹与大唐迥北淀 M3 的陶鼎相似，鼎身无彩绘，也无刻划纹饰。虽然袁台子 M3 和 大唐迥北淀 M3 的陶鼎腹部形态相似，但三座墓葬所出鼎盖捉手、鼎足、装饰都有较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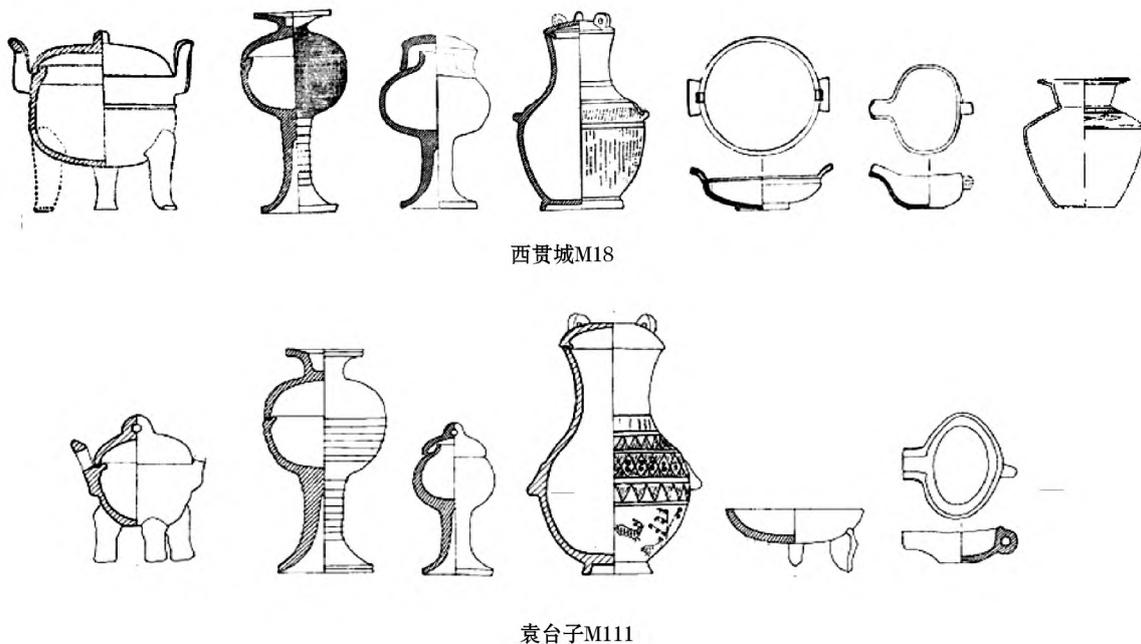
从陶圆壶上看，九女台 M16:50（图六，4），子母口上有三个火焰状小纽，壶颈相对较短，鼓腹圈足，腹中上部也各有一个兽面圆环。其上朱绘有三角纹、卷云纹等。大唐迥北淀 M3 的陶壶（图六，5），壶盖上三纽为火焰形纽，壶腹中上部有两个半环状耳，纹饰为多周弦纹。袁台子 M3:11 壶（图六，6）口为子母口，壶盖上的捉手与大唐迥北淀 M3 相似，但与九女台的两个陶圆壶不同，壶腹中上部有两个实心耳，其上纹饰为内填充横线的三角纹。这三座墓葬的壶身整体形态没有太大区别，袁台子 M3 的壶盖形态与大唐迥北淀 M3 相似，但不同地区墓葬壶的耳部和纹饰都有较大差别。

从陶豆盖上看，九女台 M16:71（图六，7），子母口，圆腹，豆盖隆起上有三个大火焰状捉手，



图六 九女台 M16、大唐迥北淀 M3、袁台子 M3 随葬仿铜陶礼器对照

1—3. 陶鼎（九女台 M16:57 大唐迥北淀 M3 袁台子 M3:1） 4—6. 陶壶（九女台 M16:50 大唐迥北淀 M3 袁台子 M3:11）
7—9. 陶豆盖（九女台 M16:71 大唐迥北淀 M3:5 袁台子 M3:12） 10—12. 陶小口壶（九女台 M16:81 大唐迥北淀 M3:8
袁台子 M3:4） 13—15. 陶盘（九女台 M16:74 大唐迥北淀 M3 袁台子 M3:8） 16—18. 陶匜（九女台 M16:65 大唐迥北淀 M3:2 袁台子 M3:9）



图七 西贯城 M18 与袁台子 M111 随葬仿铜陶礼器

长柄上有竹节纹，豆腹上部和豆盖下部各有两个环状耳，喇叭状足，豆腹和豆柄残存卷云纹彩绘。大唐迴北淀 M3 的豆盖（图六，8）与九女台 M16: 71 相比，其豆盖捉手为喇叭形，豆腹较深，柄相对更矮，无彩绘，只有豆腹和豆柄上有几周弦纹。袁台子 M3: 12 的豆盖（图六，9）上火焰形捉手比九女台 M16 更为短小，但与九女台 M16 的陶豆盖一样都是圆腹长豆柄，其上也没有彩绘图案，仅有几周弦纹。

从陶小口壶上看，九女台 M16: 81（图六，10），小口短颈，上有喇叭形捉手，壶腹为扁圆腹，细柄喇叭状圈足，盖面刻划“S”形纹，肩和腹部有两周山形纹，中间为涡纹带，壶柄上有几周弦纹，圈足上也有了两周山形纹。大唐迴北淀 M3 的小口壶（图六，11）为球形腹，盖隆起，上有小型鸟捉手，仅腹部和柄部饰有弦纹。袁台子 M3: 4 的小口壶（图六，12）与大唐迴北淀 M3 的小口壶大体相似，敛口，壶盖的捉手为大燕鸟，壶身没有纹饰。

从陶盘上看，九女台 M16: 74（图六，13），盘唇宽平，口内敛，唇下部附双侈耳，浅腹，高圈足，圈足底座上部内收。大唐迴北淀 M3 的陶盘（图六，14）没有附耳，也无彩绘，圈足也较矮。袁台子 M3: 8 陶盘（图六，15）形态有较大不同，盘为圆口圜底，没有盘唇沿，火焰状三足。可以看出，虽然九女台 M16 和大唐迴北淀 M3 的陶盘整体的形态相似，但是圈足纹饰上仍有差别，而袁台子 M3 与前两者的陶盘形态大有不同，其火焰状三足与同墓所出陶壶上的火焰状三纽相似，可能是从此获得灵感。

从陶匜上看，九女台 M16: 65（图六，16），匜口形状为扁圆形，一侧有半管状流，一侧有凤鸟兽首把手，下有兽面蹄足，足出台。大唐迴北淀 M3 的陶匜（图六，17）口形状为扁圆形，一侧有半管状流，但另一侧为半环形把手，匜下无足。袁台子 M3 的陶匜（图六，18）整体形态与大唐迴北淀 M3 相似，但半环状捉手要比大唐迴北淀 M3 大，且手制痕迹明显。可以看出九女台 M16 的陶匜与大唐迴北淀 M3、袁台子 M3 形态相差较大。大唐迴北淀 M3、袁台子 M3 虽然陶匜形态相近，但是捉手也有细微差别。

通过三座墓葬的鼎、豆、壶、小口壶、盘、匜的形态与纹饰对比，除了九女台 M16 的陶器因为墓主人地位的原因，更加精致，制作更加精细，仍可看出三座墓葬的鼎、豆、壶、小口壶、盘、匜的组合器物形态有所差别，这与袁台子燕墓因为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差异不同，是同一时期由于地域

不同,制作仿铜陶礼器的陶窑不同,周围所流行的器物形态与装饰纹饰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大唐迥北淀 M3 和袁台子 M3 墓葬墓主人地位相近,在陶鼎、陶盘的形态差异也很明显,这说明了在战国中期晚段,仿铜陶礼器是在当地的陶作坊进行生产的,而袁台子 M3 的陶豆拥有九女台 M16 和大唐迥北淀 M3 同类陶豆的一些特点,也说明在制作仿铜陶礼器时会融合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仿铜陶礼器。袁台子 M3 的三足盘与九女台 M16 和大唐迥北淀 M3 的陶盘不同,其三足采用的是与大唐迥北淀 M3 陶壶相似的火焰状纽的形态,说明在扩张区的陶作坊在制作陶礼器的时候也会参照其他器类的仿铜陶礼器进行融合、创作。

在非中心区制作批量化仿铜陶礼器并不逊色于燕下都墓葬的仿铜陶礼器。西贯城 M18^⑪和袁台子 M111^⑫都是战国早期晚段的仿铜陶礼器燕墓(图七),前者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为鼎 2、豆 2、壶 2、小口壶 2、盘 1、匝 1、尊 1。后者的仿铜陶礼器组合为鼎 1、豆 2、小口壶 2、壶 2、三足盘 1、匝 1,论鼎的数量和随葬仿铜陶礼器的数量,西贯城 M18 的墓主人的地位可能稍高于袁台子 M111 的墓主人,但袁台子 M111 的陶壶上饰有两周三角纹,两周三角纹之间还有一周菱格纹(菱格纹内有旋涡纹,外用竖线进行填充),壶腹下部还饰有走兽纹,其陶壶精美程度高于西贯城 M18 仅以弦纹和竖线斜弦纹装饰的陶壶。其他随葬品精美程度相近,这说明虽然仿铜陶礼器的生产具有地域性,但处于非中心区制作批量化仿铜陶礼器的工艺不逊色于中心区。

三、结 语

燕文化区制陶作坊具有日用器与陶礼器兼烧的现象,并且当时可能存在着定制和批量生产两种运作模式。前者主要供给高级贵族,后者则普及中小贵族及平民。高级贵族随葬的仿铜陶礼器均采用定制,仿铜陶礼器精美程度甚至器形种类与中小贵族墓葬中随葬的仿铜陶礼器不同。而中小贵族墓葬中的仿铜陶礼器多为批量产品,但有时也可以定制个别器类。陶作坊具有地域性,战国燕墓中的仿铜陶礼器一般是在当地生产的,这造成了仿铜陶礼器在同一时期还会产生形态与纹饰上的差异。

注 释:

- ① 陈光 《东周燕文化分期论(续)》,《北京文博》1998 年第 1 期。
- ② 郑君雷 《战国时期燕墓陶器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报》2001 年第 3 期。
- ③ 付琳、王立新 《朝阳袁台子周代墓葬的再分析》,《北方文物》2012 年第 3 期。
- ④⑨⑩⑪ 袁炫俊 《东周时期燕文化的扩张和东北地区文化的变迁》,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年。
- ⑤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1 期。
- 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 《房山南正遗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55—77 页。
- ⑦⑫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2 期。
- ⑧ 程长新 《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 年第 8 期。
- ⑩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77》,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第 118 页。
- 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 年—1992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第 82 页。
- ⑫⑬⑭⑮⑯ 王腾飞 《东周墓葬再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年,第 67—68 页;第 80 页;第 34 页;第 34 页。
- 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编 《平顶山应国墓地 I 上》,大象出版社 2012 年,第 574—580 页。
- ⑱⑲⑳㉑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袁台子:战国西汉遗址和西周至十六国时期墓葬》,文物出版社 2010 年,第 39—168 页;第 45、46 页;第 125—128 页。
- ㉒㉓ 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三河县文化馆 《河北三河大唐迥、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 年第 4 期。
- ㉔ 临淄区文物局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辛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13 年第 1 期。
- ㉕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 《燕下都》(上册),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第 541—574 页。

(责任编辑 田索菲 薛凯帆)